

徘徊在“三岔路口”：两代农民工发展意愿的比较研究

悦中山¹，李树茁²，费尔德曼³，杜海峰⁴

(1. 西安交通大学 管理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49;

2. 西安交通大学 人口与发展研究所, 陕西 西安 710049;

3. 斯坦福大学 人口与资源研究所, CA 94305, USA;

4. 西安交通大学 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49)

摘要：利用2005年深圳农民工调查数据，全面考虑了农民工所面临的返乡务农、返乡非农就业和留城发展等三种发展选择，对两代农民工的发展意愿进行了比较研究。研究发现，在中国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将外出打工看做是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积累过程并借此来谋求非农职业转化。老一代农民工的非农职业转化的发展意愿不如新生代强烈。

关键词：农民工；新生代；回流迁移；城市化

中图分类号：F30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49(2009)06-0058-09

Wandering at Crossroad: A Comparative Study on Development Will of Two Generations of Migrant Rural Workers

YUE Zhong-shan¹, LI Shu-zhuo², Marcus W. Feldman³, DU Hai-feng⁴

(1. School of Management,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49, China;

2. Institute for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49, China;

3. Morrison Institute for Population and Resource Studies, Stanford University, CA 94305, USA;

4.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49,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census data of migrant rural workers in Shenzhen 2005 and the three choices they face, namely returning to village for farming, returning to village and doing other work and stay in city, a comparative study is made on development will of two generations of migrant rural workers. The research founds that in the socioeconomic transition, the new generation of the migrant rural workers are more apt to view working in cities as a accumulative process of their human and social capital, which will be used by them as foundation for their shift from farming to other areas. The will of the older generation is far less intense.

Keywords: migrant rural worker; the new generation; back flow transfer; urbanization

收稿日期：2009-01-03；修订日期：2009-06-23

基金项目：自然科学基金(70671083)；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NCET-07-0668)；西安交通大学“985工程”二期重点项目(07200701)；“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长江学者和创新团队发展计划(IRT0855)；美国 Santa Fe Institute 国际项目基金、斯坦福大学联合资助项目；陕西省社科基金(08H002)。

作者简介：悦中山(1980-)，蒙古族，河北丰宁人，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社会网络分析、人口社会系统分析。

一、研究背景

中国“民工潮”从开始到现在已经 20 多年,农民工正在经历着从老一代^①向新生代的转换。1980 年代,在寻求并维持生存甚至糊口而非追求利润的最大化的“生存理性”的驱使下,中国老一代农民工为了自己和家庭的生存开始选择外出务工^[1~3]。赚钱是他们的主要目的,“乡”“土”仍是他们基本的生存保障,是其割舍不开的心理情结,经过一段时间的迁移以后,绝大部分会返回家乡^[4]。1990 年代以后,那些出生在 1970 年代末,在 1980 年代接受教育的新生代农民工开始大量涌入城市。与老一代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年轻,受教育水平较高,缺乏农业生产经验,更希望留城发展^[5]。研究显示,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外出打工的动因已经实现了从“生存理性”到“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的跃迁^[6]。新生代外出的目的已经从单纯的“赚钱”走向多元化,城市所提供的个人发展机遇和现代生活方式对他们的吸引越来越大,“学技术”,“见世面”往往是他们走出农村的重要原因^[7]。据此,如果我们沿用黄平的说法^[8],将“寻求生存”概括为老一代农民工的生活逻辑,那么我们不妨将“寻求发展”概括为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逻辑。

尽管生活逻辑发生了改变,但新生代农民工所面临的融入城市社会的困难较老一代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制度因素和非制度因素的共同作用导致了他们在就业、住房、子女教育、社会保障、福利待遇等方面处于城市的边缘地位^[9~12]。这使得绝大部分农民工不得不选择返乡,仅有少数在生意或职业上发展得比较成功的农民工能留在城市。谈及未来发展意愿,无论老一代,还是新生代,农民工无非有三种选择:第一种选择是留城发展,“离土又离乡”,这有利于推动中国城市化进程;第二是返乡非农就业,“离土不离乡”,是一条“自下而上”的城市化道路,有利于乡镇经济的多元化发展;第三是返乡继续从事农业生产。从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角度来看,农民工的非农职业选

择,即无论是返乡非农就业,还是留在城市,都将有助于缓解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所带来的压力,有利于推动中国城市化进程^[13]。

鉴于两代农民工生活逻辑的不同,从代际视角分析两代农民工的发展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的差别,将是很有意义的工作,但类似的定量研究还很少见。另外,已有研究要么将返乡务农和返乡非农就业不加区分地作为返乡行为进行研究,要么仅仅对留城意愿进行关注。而事实上,农民工的发展路径并不是非“留城”即“返乡”的“双行道”,而是一个面对三种选择的“三岔路口”。基于“三岔路口”的研究框架,本研究主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引进代际视角,分析两代农民工在发展意愿上的差别;第二,比较两代农民工发展意愿影响因素的异同。

二、相关理论与实证研究

(一)“留”还是“返”

无论是国际迁移还是国内迁移,回流迁移是劳动力迁移的重要组成部分^[14~15]。迁移原因和回迁原因的研究受到经济学和社会学的一贯重视,经济学和社会学中一些理论为我们研究农民工的“留城”与“返乡”决策的形成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16~19]。但是,单一的经济理论和社会学理论都不能对迁移者的“留”“返”决策给出满意解释,更多的研究者认为回迁基本上是多种经济的、社会的和文化的“拉力”和“推力”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20~21]。总结不同理论和实证研究的成果,本文最终将影响迁移者“留”“返”决策的影响因素归纳为个人因素、家庭因素、迁移因素和迁入迁出地的社会经济环境等四类。

个人因素中的教育、迁入地语言的掌握程度、工作经验等人力资本变量一直为研究者所强调^[22~24]。迁移者的社会资本也受到关注,有研究者指出个人的社会资本缺失和匮乏也可能导致迁移者回迁^[25]。另外,康思登(Constant)等的研究表明迁移个体的迁移动机对其返乡决策也具有重要影响^[26]。

① 在已有文献中,“第一代”是常用的术语。但是,为了避免与国际移民研究中基于父代子代定义的“第一代”,“第二代”等概念的混淆,本文采用“老一代”来定义这一群体。而且,这样能够更好地与“新生代”对应起来。

对家人的依恋以及家庭责任等家庭因素影响迁移者决策的做出。迁移者对家乡的家人、朋友的依恋给他们带来的心理成本,生病的或者年迈的父母,未发生迁移的配偶等这些“拉力”因素最终会促成迁移者返乡决策的做出^[2]。

劳动者迁移过程中的生活工作状况也会对他们最终决策产生影响。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收入和职业声望作为迁移者的收益,对他们发展决策的做出具有重要影响^[28~29]。

迁入地、迁出地的社会经济环境对迁移者决策的做出有重要影响。迁入地社会的经济衰退,个别行业的不景气等经济因素都是导致迁移人口回迁的重要原因^[30]。迁出地的经济条件也是迁移者决定“留”“返”的重要因素,关于国际移民的研究发现,迁出地若不能为迁移劳动力提供充分的就业和一定的生活水准,迁移者往往很少有人选择返乡^[31]。

(二) 中国农民工的返乡与留城研究

关于中国农民工返乡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赵耀辉(Yaohui Zhao)发现回迁农民工往往年龄较大、已婚、受过较好教育、在城市从事体力劳动、配偶未发生迁移^[32]。王文菲(Wenfei Winnie Wang)等认为,农民工留城定居机会有限,从而促使他们与家乡保持紧密联系,家庭责任是回迁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也发现年龄是农民工返乡的重要预测变量,年龄越大越可能返乡^[33]。对留城意愿的研究其实是回迁研究的另一角度。曾旭晖等的研究表明教育、家庭因素以及对城市市民和政府的认同态度等是农民工决定留城的重要影响因素^[34]。熊波和石人炳发现职业类别、收入状况和住房状况对农民工定居城市的意愿有显著的影响,而性别、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的影响不显著^[35]。

基于对农民工返乡、留城意愿影响因素的研究,结合留城和返乡农民工的特征比较,已有研究在教育的选择性上还存在一些争议,导致研究者对回迁农民工为乡村经济发展所作贡献的评价褒贬不一。一些学者发现,留城农民工的教育水平往往较高,而回迁农民工往往年龄较大,受教育程度不高,大多回归到传统的经济结构中,他们对家乡经济发展所起到的作

用比较有限^[36~37]。而有学者则发现,由于迁入地对人力资本的回报较低,导致具有较高教育水平的农民工最终返乡;返乡农民工的城市就业经验对他们非农职业的转化具有重要作用,回迁农民工缓解了农村人才流失现象,他们的投资行为为家乡发展作出了贡献,返乡创业的农民为农村地区提供了就业机会,促进了乡村经济的多元化发展^[38~40]。

已有研究为本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和实证基础,虽然发现年龄对农民工的返乡和留城决策具有重要影响,但还缺乏在“三岔路口”的研究框架下,对农民工发展意愿的代际视角的关注。已有结论也还存在一些争议,希望本文能为此提供新的解释。

三、数据与方法

(一) 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用数据是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2005年4月底在广东省深圳市完成的农民工调查数据。此次调查的对象为“年龄在15周岁以上,非深圳户籍的外来农民工”。调查过程中将调查对象分为聚居类和散居类。聚居类农民工指集中居住在工厂宿舍或工棚的农民工,采用整群抽样,在宝安、南山和龙岗等3个区获取有效问卷547份;而散居类农民工指分散居住在市民小区或外来人口与市民混居的居民区中的农民工,采用等距抽样在南山、罗湖、盐田等3个区获得合格问卷1192份。调查内容包括农民工的基本情况、迁移历史、家庭情况、在城市生活工作状况。另外我们还借鉴范德普尔^[41]的研究,在调查中收集了农民工的实际支持、情感支持和社交支持等三类社会支持网络的信息。在实地调查和数据录入过程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进行质量控制,最终在10个调查点,历时8天获得1739份有效问卷。

(二) 研究方法与变量设置

本文利用深圳农民工调查数据,将未来发展意愿分为“返乡务农”、“返乡非农就业”和“留城发展”三类,以“返乡务农”为参照组,利用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发展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为检验代际变量对发展意愿的影响,先将所有样本纳入模型;随后为比较两代

农民工发展意愿的影响因素的异同，针对老一代和新生代农民工分别构建了模型。

1. 因变量

调查问卷中通过问题“您以后准备在哪里长期发展或者定居”来获取农民工发展意愿的信息。本研究最终把发展意愿分为三类：返乡务农、返乡非农就业和留城发展。其中返乡非农就业包括返乡后“自己找工作”和“自己创业”两类。

2. 自变量

关于老一代与新生代的代际划分，可以基于初次外出的年代或者年龄两个维度来区分，但实际操作起来，差别不大^[43]。本文采用王春光的定义，即新生代农民工是指那些出生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80年代接受教育，自90年代以后开始陆续迁入城市务工的农村青年^[43]。实际操作中，本研究将1975年及以后出生的农民工定义为新生代农民工。

本研究以文献综述中所总结的四类影响因素为参考，将迁入地和迁出地因素分开，同时

考虑了本次调查中数据的可获取性，除了代际变量之外，将自变量划归为五类因素。表1给出了本文对自变量的定义和操作方法。

第一类为个人因素，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态、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迁移动机等。其中人力资本因素中除了教育水平，还包括农民工城市中务工时间的长短（即迁移时间），以及工作更换情况和方言的掌握等，它们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农民工在城市务工过程中人力资本的积累情况。我们通过农民工的三类社会支持网络对他们的社会资本进行度量，由于三类社会支持网络的网络成员存在较大重叠，因此本研究中将三类社会支持网络的平均规模作为对农民工社会资本的测度，回归分析中将那些比均值大于1及以上的赋值为1，其他赋值为0。

第二类为家庭因素，包括配偶、孩子和老人的情况。“配偶在家乡”、“孩子在家乡”和“父母健康状况”等变量既可用来反映农民工迁移所承受的心理代价，也可反映农民工担负的家庭责任，详细定义见表1。

表 1 自变量及其定义

自变量	定义
代际变量	
新生代	年龄为 30 岁及以下的农民工
个人因素	
男性	被访者为男性
年龄	被访者在调查时的年龄（年）
已婚	婚姻状态为已婚
人力资本	
教育水平	
小学及以下	参照组（被访者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下的）
初中	被访者受教育程度为初中
高中及以上	被访者受教育程度为高中（含中专、技校）、大专及以上
迁移时间	第一次迁移至调查实施时的时间长度（月）的常用对数
工作经验	具有从事了 2 份及 2 份以上的工作经历
方言掌握	会说广东话
社会资本	
迁移动机	比社会支持网平均规模的均值大于 1 及以上
经济或家庭原因	因赚钱、家庭团聚、结婚等经济家庭原因发生迁移，为参照组
学技术、见世面	因求学、学手艺、见世面或向往城市生活而发生迁移
家庭因素	
配偶在家乡	被访者已婚且配偶在家乡
孩子在家乡	被访者的孩子≤16 岁且在家乡
父母健康状况	被访者的父亲或母亲健在，健康状况为基本自理或更差，已经无法做家务、干农活或工作
工作生活状况	
社会经济地位	
体力劳动者	被访者为商业或服务业劳动者、产业工人
收入	每月收入（元）的常用对数
散居	被访者居住在市民小区或外地人与市民混居的居住区
迁入地社会环境	
市民歧视	被访者报告经常遭遇市民歧视
迁出地社会经济状况	
西部	参照组（被访者来自西部，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
中部	被访者来自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
东部	被访者来自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广西、海南

第三类工作生活状况包括农民工当前社会经济地位和居住状况。社会经济地位通过是否为体力劳动者和收入来度量。居住环境是测度农民工城市生活状况的一个重要参数。“散居”的居住环境有利于农民工与城市市民的充分交流，有利于他们对城市主流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接受和认可。

最后两类变量主要是对迁入地、迁出地的社会经济环境的间接测度。本文通过农民工是否曾经受到歧视来反映迁入地的社会环境。为了衡量迁出地的社会经济状况，本文参考中国国家统计局的划分标准将农民工的迁出地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

另外，本研究对样本做了如下两个处理。第一，删除了对未来发展意愿还“拿不定主意”的98个样本。第二，由于回迁选择性的存在，早期农民工中的一些“失败者”或已经实现既定目标的“成功者”已经返乡，而那些事业发展得更加顺利的“成功者”则逐渐沉淀到城市，从而可能会导致采样存在偏差。为了修正这个问题，本研究将在深圳拥有房产的43个“潜在”或者“实际”的城市定居样本删除。经过处理，最终进入模型的样本数为1598个，其中老一代农民工762个，新生代农民工836个。表2给出了模型中自变量的描述性信息。

表 2 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信息

自变量	所有样本		老一代		新生代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新生代	0. 52	0. 50	—	—	—	—
个人因素						
男性	0. 51	0. 50	0. 66	0. 47	0. 37	0. 48
年龄	30. 78	8. 33	37. 89	5. 87	24. 31	3. 62
已婚	0. 66	0. 48	0. 94	0. 23	0. 39	0. 49
人力资本						
教育水平						
初中	0. 58	0. 49	0. 55	0. 50	0. 61	0. 49
高中及以上	0. 29	0. 46	0. 25	0. 43	0. 34	0. 47
迁移时间	1. 76	0. 43	1. 88	0. 43	1. 64	0. 40
工作经验	0. 40	0. 49	0. 40	0. 49	0. 39	0. 49
方言掌握	0. 24	0. 43	0. 22	0. 41	0. 27	0. 44
社会资本	0. 11	0. 31	0. 12	0. 33	0. 10	0. 30
迁移动机						
学技术、见世面	0. 23	0. 42	0. 06	0. 23	0. 38	0. 49
家庭因素						
配偶在家乡	0. 15	0. 35	0. 24	0. 43	0. 06	0. 24
孩子在家乡	0. 34	0. 47	0. 50	0. 50	0. 19	0. 39
父母健康状况	0. 17	0. 37	0. 26	0. 44	0. 08	0. 28
工作生活状况						
社会经济地位						
体力劳动者	0. 66	0. 47	0. 58	0. 49	0. 74	0. 44
收入	3. 06	0. 27	3. 11	0. 29	3. 02	0. 24
散居	0. 67	0. 47	0. 77	0. 42	0. 57	0. 50
迁入地社会环境						
市民歧视	0. 02	0. 15	0. 04	0. 18	0. 01	0. 12
迁出地社会经济状况						
中部	0. 47	0. 50	0. 48	0. 50	0. 45	0. 50
东部	0. 29	0. 46	0. 26	0. 44	0. 32	0. 47
样本数(个)	1598	—	762	—	836	—

数据来源: 2005 年深圳农民工调查。

四、结果

(一)两代农民工发展意愿的比较

表3 提供了农民工发展意愿的分布情况。新生代农民工占总样本的 52.3%，比例稍高于老一代农民工。两个群体在发展意愿的分布上表现出了显著差别：老一代农民工留城发展意愿比新生代高近 5 个百分点；打算返乡的农民工中，老一代仅有 12.6%的人打算返乡非农就业，表示继续务农的比例高达43.4%，而新一

表3 老一代与新生代农民工发展意愿分布情况 %

发展意愿	所有样本	老一代	新生代
返乡务农	29.9	43.4	17.6
返乡非农就业	28.6	12.6	43.2
找非农工作	19.5	6.8	31.0
自己创业	9.1	5.8	12.2
留城发展	41.5	44.0	39.2
样本数(个)	1598	762	836

数据来源：同表 2。

代农民工中，43.2%的人愿意返乡非农就业，仅 17.6%的人表示继续务农。新生代不再愿意返乡务农在这里得到验证，但就留城而言，老一代中打算留城发展的比例稍高，两代农民工之间是否存在显著差别，有待在多变量分析中进行检验。

(二)影响因素分析

表 4 提供了农民工发展意愿影响因素分析的全样本模型、老一代及新生代模型的回归结果。由于新生代变量基于年龄生成，因此年龄未被纳入到全样本模型。全样本模型中，在控制了其他可能影响到发展意愿的变量之后，可以发现：返乡务农和返乡非农就业相比，新生代选择返乡非农就业的可能性是老一代的 3.3 倍；返乡务农和留城发展相比，新生代选择留城发展的可能性是老一代的 1.4 倍。从而表明新生代的发展意愿较老一代有明显区别，新生代农民工较老一代具有更强的实现非农职业转换的愿望。

表 4 农民工发展意愿的多元 Logistic 回归结果

自变量	全样本模型(几率比)		老一代模型(几率比)		新生代模型(几率比)	
	返乡非农就业	留城发展	返乡非农就业	留城发展	返乡非农就业	留城发展
新生代	3.284***	1.372 ⁺	—	—	—	—
个人因素						
男性	0.843	0.825	0.907	0.973	0.922	0.858
年龄(年)	—	—	0.888***	0.977	0.954	0.946
已婚	0.731	0.772	0.553	0.746	1.208	1.223
人力资本						
教育水平						
初中	3.691***	1.480 ⁺	2.830*	1.396	5.179**	2.605*
高中及以上	8.082***	3.156***	7.508***	2.079**	13.578***	8.668***
迁移时间	0.779	0.896	1.298	0.982	0.668	0.926
工作经验	1.290	1.221	0.905	0.981	1.824*	1.849*
方言掌握	1.738*	1.884**	1.824	2.102*	1.605	1.679
社会资本	1.517 ⁺	0.971	1.394	0.690	2.552*	2.000
迁移动机						
学技术、见世面	3.634***	2.621***	3.463*	2.672 ⁺	3.263***	2.297**
家庭因素						
配偶在家乡	0.558*	0.530**	0.652	0.636 ⁺	0.555	0.372*
孩子在家乡	1.139	0.826	1.020	0.851	0.830	0.630
父母健康状况	0.734	0.714 ⁺	0.936	0.652*	0.748	0.975
工作生活状况						
社会经济地位						
体力劳动者	0.619*	0.486***	0.603	0.452***	0.851	0.670
收入	0.478*	1.455	0.532	1.629	0.387 ⁺	1.339
散居	0.631*	2.001***	0.618	3.045***	0.573*	1.621 ⁺
迁入地社会环境						
市民歧视	0.548	0.549	0.487	0.647	0.699	0.502
迁出地社会经济状况						
中部	0.957	1.115	0.750	0.845	1.450	1.728 ⁺
东部	0.937	1.711*	1.085	1.491	1.013	1.968 ⁺
Chi-square	647.02***	—	246.63***	—	228.60***	—
样本数(个)	1598	—	762	—	836	—

注：***p< 0.001； ** p< 0.01； * p< 0.05； + p< 0.1。
数据来源：同表 2。

从老一代模型中可以发现,年龄显著地降低了返乡农民工非农就业的可能性;人力资本因素如教育和方言对农民工选择非农职业具有正向作用;方言掌握对留城发展的农民工有正向影响,但对打算返乡的农民工的职业选择的影响并不显著;社会资本对农民工非农职业的选择没有显著影响;迁移动机对老一代农民工的非农职业选择具有重要影响;家乡的配偶和需要照顾的父母显著地降低了农民工留城发展的可能性;从事体力劳动的农民工在面对返乡务农和留城发展的选择时,更可能选择返乡务农;散居可以显著地提高他们留城发展的可能性。

新生代农民工模型显示,教育和工作经验对新生代农民工的非农职业选择具有正向作用;返乡务农和返乡非农就业相比,社会资本丰富的新生代农民工选择返乡非农就业的可能性比社会资本比较匮乏的新生代农民工更高;迁移动机对新生代的非农职业的选择有显著影响,以“学技术、见世面”为目的的新生代,与那些因为经济目的或家庭婚姻目的发生迁移的农民工相比,前者返乡非农就业的可能性是后者的3.3倍,在返乡务农和留城发展的两个选择上,前者留城发展的可能性是后者的2.3倍;家庭因素中,仅配偶的影响显著,配偶留在家乡的农民工的留城发展可能性较小;与返乡非农就业相比,收入较高的新生代比收入较低的新生代更可能选择返乡务农;散居提高了新生代农民工留城发展的可能,但散居的居住环境使得返乡的农民工更可能继续务农;迁出地的经济地理状况则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留城发展具有显著影响,来自中部和东部等社会经济状况较好和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农民工较西部地区的农民工更倾向于留在城市。

通过计算相应系数的比值,我们可以得到各因素在返乡非农就业和留城发展两种选择上的系数,其中代际变量、教育变量和迁移动机变量的作用尤其值得一提。全样本模型中,返乡非农就业与留城发展相比,新生代选择返乡非农就业的可能性是老一代的2.4(3.284/1.372)倍。老一代模型和新生代模型中,同理可知受教育程度越高,以“学技术、见世面”为迁移动机

的农民工最终选择返乡非农就业的可能性较留城发展要高。

通过对新生代与老一代农民工发展意愿影响因素的比较,发现两代农民工发展意愿的影响因素存在着一些显著差异:迁出地社会经济状况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留城发展具有显著影响,而对老一代没有影响;人力资本因素中,工作经验对新生代未来的发展意愿具有积极作用,但对老一代没有显著影响;社会资本的拥有情况对新生代选择返乡非农就业有显著影响,对老一代农民工则不然;由于所处生命周期的不同,老一代农民工所担负的家庭责任远远大于新生代,因此可以看到,老一代可能因为配偶和父母的原因而决定返乡,而对新生代,只有在家乡的配偶是其返乡的影响因素;从事体力劳动的老一代农民工的留城发展可能性很小,而新生代农民工对此似乎不敏感。

五、讨论与总结

本研究利用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2005年深圳农民工调查数据,全面考虑了农民工所面临的三种发展选择,将其纳入同一分析框架并引进了代际视角,对新生代和老一代农民工发展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比较研究。下面就一些重要发现进行讨论并总结。

研究发现代际变量是决定农民工发展意愿的重要预测变量,新生代农民工较老一代农民工在非农职业转换(包括留城发展和返乡非农就业)上具有更强烈的愿望,返乡非农就业已经成为新生代农民工最主要的选择。可见,新生代农民工已经不再像老一代农民工一样,对土地还抱有很深的感情,他们更渴望离开土地,希望留在城市,但由于制度和社会经济上的双重弱势地位,新生代也很难融入城市社会,返乡非农就业成为新生代农民工向现实妥协后无奈的次优选择。

与老一代农民工“寻求生存”不同,“寻求发展”已经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逻辑。研究表明两代农民工在发展意愿影响因素上存在显著差别。对这些差异可能的解释是,在当今中国社会经济的转型时期,中国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将打工看做是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逐渐

积累的过程并借此来谋求实现非农职业的转化。但同时也要看到,与新生代一样,老一代农民工中尤其是那些受教育水平较高、迁移动机为“学技术、见世面”的农民工,也希望实现非农职业的转化,说明老一代农民工的生活逻辑也在时代的变迁中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对此可能的解释是,根据吉登思(Giddens)的结构化理论,黄平等认为农民工的外出可以被看做是主体和结构二重化的过程,尽管农民工最早外出的目的是赚取更多的现金,但在打工的过程中,他们会不断地对自己的行动加以合理解释,总是不断地反思自己的行为,并会调整自己的策略^[44]。但因为所处生命周期的不同和家庭责任较重等原因,老一代农民工实现非农就业的愿望还是不如新生代来得强烈。

本研究为以往研究中的一些争议提供了较为合理的解释。本文发现,返乡务农在教育上表现出负向选择性,而返乡非农就业与留城发展相比,返乡非农就业在教育上则是一种正向选择。可见,返乡并非必然地在教育上表现出负向选择性,希望返乡非农就业者反而比希望留城发展者有更高的教育水平。这可能因为当前中国城乡二元劳动市场的存在导致农民工大部分只能从事那些对人力资本回报不高的脏、累、险的工作,而返乡非农就业则对教育有更高的回报^[45]。考虑到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我们认为返乡非农就业者会对乡村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同时考虑到教育对农民非农职业转化的重要作用,第二代移民(即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应该引起重视。

本文的研究和发现还存在一定局限性。首先,由于深圳农村流动人口调查并不是为研究农民工发展意愿而专门设计的,因此导致一些已被发现的重要变量并没有被纳入到本研究中,可能会对研究结果有一定影响。其次,本研究基于深圳农民工的横向截面数据完成,而非纵向数据。某个同期群中外出务工的农民工有些“失败者”可能已经返乡,而那些发展比较成功的农民工则可能会积淀到城市,这种累积效应可能导致横向截面数据有偏。尽管本研究对样本中一些潜在的城市定居者进行了删除处理,但还会或多或少地影响到本文的研究发现。

不过好在这种影响对发展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比较有限。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农民工的发展意愿并不必然会演化为农民工的现实行为,将发展意愿研究与相应的行为研究进行对比,会进一步加深学术界及政府相关部门对农民工迁移流动行为的理解,相关问题值得继续深入探讨。

参考文献:

- [1] 黄平. 寻求生存的冲动:从微观角度看中国农民非农化活动的根[J]. 二十一世纪(香港), 1996 (12).
- [2] 黄平, 郭于华, 杨宜音等. 寻求生存——当代农村外出人口的社会学研究[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7.
- [3] 文军. 从生存理性到社会理性选择:当代中国农民外出就业动因的社会学分析[J]. 社会学研究, 2001, (6): 19—30.
- [4] 王春光. 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J]. 社会学研究, 2001, (3): 63—76.
- [5] 同[4].
- [6] 同[3].
- [7] 罗娟.“新生代”农民工的期盼:我们出来不只想挣点钱[EB/OL]. 2007—05—08, 2008—08—15. http://www.gov.cn/jrzq/2007-05-08/content_607303.htm.
- [8] 同[1][2].
- [9] 刘传江, 周玲. 社会资本与农民工的城市融合[J]. 人口研究, 2004 (9): 12—18.
- [10] 杨绪松, 靳小怡, 肖群鹰等. 农民工社会支持与社会融合的现状 & 政策研究——以深圳市为例[J]. 中国软科学, 2006, (12): 18—26.
- [11] 李树茁, 杨绪松, 悦中山等. 农民工社会支持网络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 27 (1): 67—76.
- [12] 李树茁, 任义科, 靳小怡等. 中国农民工的社会融合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社会支持网络的分析[J]. 人口与经济, 2008 (2): 1—8.
- [13] Ma Z. Temporary migratio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China [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1999, 31 (5): 783—802.
- [14] Gmelch G. Return Migration [J].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1980, 9: 135—159.
- [15] Zhao YH.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return migration: Recent evidence from China [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02, 30 (2): 376—394.
- [16] Todaro MP. Internal Migr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M].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r Office, 1976.
- [17] Piore MJ. Birds of Passage: Migrant Labor in Industrial Societie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 [18] Massey DS.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immigration [J].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1990, 510: 60—72

[19] Orrenius PM. Return Migration from Mexico: Theory and Evidence[D]. Los Angeles,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99.

[20] 同[14] [15].

[21] Constant A, Massey DS. Return migration by German guestworkers: Neoclassical versus new economic theories[J].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2002, 40 (4): 5—38.

[22] Borjas GJ. Immigrant and Emigrant Earnings: A Longitudinal Study[J]. Economic Inquiry, 1989, 27 (1): 21—37.

[23] Newbold KB. Counting Migrants and Migrations: Comparing Lifetime and Fixed—Interval Return and Onward Migration [M]. Clark University, 2001: 23—40.

[24] Wang WW, Fan CC. Success or failure: selectivity and reasons of return migration in Sichuan and Anhui, China [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006, 38 (5): 939—958.

[25] 同[19].

[26] 同[21].

[27] 同[14] [21].

[28] 同[21].

[29] 同[17].

[30] 同[14] [21].

[31] 同[14].

[32] 同[15].

[33] 同[24].

[34] 曾旭晖, 秦伟. 在城农民工留城倾向影响因素分析[J]. 人口与经济, 2003 (3): 50—54.

[35] 熊波, 石人炳. 农民工定居城市意愿影响因素——基于武汉市的实证分析[J]. 南方人口, 2007, 22(2): 52—57.

[36] Bai N, He Y. Returning to the Countryside versus Continuing to Work in the Cities: A Study on Rural Urban Migrants and Their Return to the Countryside of China[J].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2003 (4): 149—159.

[37] Liang Z, Wu Y. Return migration in China: new methods and findings[C]. Annual Meeting of the Population Association of America: Minneapolis, MN, 2003.

[38] 同[15].

[39] Ma Z. Urban labour-force experience as a determinant of rural occupation change: evidence from recent urban-rural return migration in China[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001, 33 (2): 237—255.

[40] Ma Z. Social—capital mobilization and income returns to entrepreneurship: the case of return migration in rural China [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002, 34 (10): 1763—1784.

[41] Van Del Poel. Delineating Personal Support Network[J]. Social Networks, 1993, 15: 49—70.

[42] 同[4].

[43] 同[4].

[44] 同[4].

[45] 同[15].

[责任编辑 童玉芬]

（上接第 57 页）

参考文献:

[1] 王学义, 曾祥旭. 对我国近年来人口预测研究的述评[J]. 理论与改革, 2007, (6): 157—160.

[2] K. M. Hornik, M. Stinchcombe & H. White. Multilayer feedforward networks are universal approximators[J]. Neural Networks, 1989, 2(5): 359—366.

[3] 李江帆. 中国第三产业发展研究[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5: 36.

[4] T. P. Vogl, J. K. Mangis, A. K. Zigler, W. T. Zink and D. L. Alkon, Accelerating the convergence of the backpropagation method[J]. Biological Cybernetics, 1988, 59: 256—264.

[5] 李江帆. 中国第三产业发展研究[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5: 36.

[责任编辑 童玉芬]